

彩虹家庭的現身： 家長與子女表現的整合分析

李怡青（台灣大學心理學系）

同性伴侶經營家庭（簡稱彩虹家庭），從過往社會中的極少數，到現今挑戰不同社會對於家庭規範與法律保障的局限性。在多國通過婚姻平權法案之後，同性伴侶擁有人工生殖與領養的權利，使其家庭樣態更加多元。過往整合分析研究者發現彩虹家庭的家庭功能、家長與子女的表現，和異性伴侶家庭（簡稱預設型態家庭）一樣好，但未能檢視研究與樣本特性對於兩類家庭比較結果的影響，尚有不足。此外，即使多國已通過婚姻平權法案，許多學者和民眾仍有刻板印象（如，男性能否稱職養育子女？）或疑慮（如，異性伴侶家庭的優勢在小孩年紀較長時才出現？）。本文以量化整合分析方法，比較彩虹家庭與預設型態家庭的家庭功能、家長和子女表現，重複驗證兩類家庭型態一樣好的結論。此外，本文回答過往的實徵研究與整合分析無法回答的問題：同性伴侶父親的表現與同性伴侶母親一樣好，亦與預設型態家庭的表現一樣好。本文亦發現，人工生殖或領養的家庭功能兩類家庭大致相仿；子女的種族比例與家庭功能、家長和子女的表現無關；隨著年齡增長，彩虹家庭子女的認知表現與自我評估會越來越好。文中並深入探討家庭功能、家長與子女表現的促進因子與危險因子。

關鍵詞：同性父親、同性母親、人工生殖、領養

收稿日期：2019 年 1 月 10 日；接受日期：2019 年 11 月 26 日。

一、前言

根據行政院家庭統計資料（行政院主計處，2006；行政院性別平等會，2018），國人核心家庭的比例逐漸減少，例如1988年59.1%，2015年減少至35.5%。三代同堂或核心家庭之外的另類家庭（單人、單親、夫妻與其他類型家庭）則逐年增加，例如1988年24.2%，2015年增加至49.1%。其中，同性伴侶建立的家庭（以下簡稱彩虹家庭）無論在數量、能見度、社會權益發聲上，都有逐年增加的趨勢。大法官於2017年5月24日公布司法院釋字第七四八號解釋，指出《民法》第4編親屬第二章婚姻：「未使相同性別二人，得為經營共同生活之目的，成立具有親密性及排他性之永久結合關係，與此範圍內，與憲法第22條保障人民婚姻自由及第7條保障人民平等權之意旨有違。」然而，隔年年底，反對同性婚姻的保守勢力，激發人民對彩虹家庭挑戰華人傳統家庭的憂慮與反對聲浪，成功推動並通過將民法婚姻限於一男一女結合的公投，立法院則制定《司法院釋字第七四八號解釋施行法》以專法規範同性婚姻。

檢視國內報紙中對於婚姻平權的正反意見，大致與其他國家對於婚姻平權辯論的正反意見相仿。舉例來說，正方意見認為愛情、婚姻、組成家庭是基本人權（67.7%，資料取自 Lee and Lin, in submission），剝奪同性伴侶婚姻權是對於同性戀者不平等的對待與偏見（52.5%）；婚姻平權可提供同性伴侶或子女的權益保障（26.8%）。反方意見則認為異性戀才是婚姻與家庭的最佳／基本形式（46.8%），同性婚姻會有不好的結果（50.5%），以及這樣的後果需要

致謝詞：本文接受科技部經費補助（NSC-104-2410-H-004-052-MY2），於此致謝。此外感謝計畫助理廖妹安、陳力瑜、蔡雅立對本研究與本文校稿和編輯的協助。

社會共同承擔，因此要有社會共識方能為之（43.6%）。比對國外針對婚姻平權公眾論述的研究發現，國內正方意見與國外婚姻平權運動以人權為基調的路線相仿（Ellis, 2004; Ellis and Kitzinger, 2002; Lee and Lin, in submission）；國內反方意見亦與國外的反方意見大量重疊（Jowett, 2014; Lee and Lin, in submission）。

本研究的動機來自筆者參與婚姻平權辯論過程中，發現正反立場對立的爭辯往往根基於不同的預設，當時台灣的婚姻平權立法正值關鍵討論，透過實徵研究（empirical studies）證據來檢視兩方的預設，能有重要意義與貢獻。持反方立場的學者（如在我國公聽會以學者身分列席的曾品傑、Katy Faust、被列為公聽會相關資料的 Phelan, Whitehead, and Sutton, 2009）與民眾意見（如讀者投書，備課漢，2016）主張符合性別刻板印象的家庭才是最佳家庭型態，因此反對賦予同性伴侶成家權益（李怡青，出版中）。兩方預設最大的關鍵差異在於彩虹家庭與異性伴侶家庭（以下簡稱預設型態家庭）的差異程度。彩虹家庭是否真如反方所稱，對於個人、家庭、社會有不好的結果，所以應該等到有社會共識後，才能做體制面上的改革，由社會所有人共同承擔不好的結果？抑或如正方所稱，彩虹家庭與預設型態家庭實無明顯差異，在體制面上剝奪同性伴侶經營家庭的權利是不公平的對待與偏見？

本研究採整合分析法（meta-analysis or research synthesis），多方面評估彩虹家庭與預設型態家庭的異同。整合分析為一種實徵研究方法，研究對象為相同主題、已執行完成的研究成果，將這些研究結果透過標準化的量尺轉換，取得效果量（effect sizes），進而檢視這些研究的效果量強度、效果量變異情況，解釋效果量變異的因素，其結論可超出個別研究的結論。舉例來說，各個實徵研究都有樣本特性或文

化氛圍的限制，只能凸顯特定樣本或文化氛圍下家庭比較的結果，整合分析則可以透過統整相關研究結果，檢視不同樣本特性或文化氛圍特性對於兩類家庭比較結果的影響。本文透過檢驗過往研究，以效果量、效果量變異情況、解釋效果量變異的因素等各項證據，對台灣社會面對婚姻平權正反雙方的爭議與衝突，提供有建設性的社會對話證據。

二、文獻回顧

整體檢視過往研究可以發現兩類家庭大同小異。這些研究顯示無論是在家長特性、親子關係的比較上，都發現彩虹家庭與預設型態家庭有穩定的相似性（Allen and Burrell, 2002; Crowl, Ahn, and Baker, 2008）。¹在子女的認知發展、性別角色發展、性別認同、性傾向認同上亦無明顯不同（Allen and Burrell, 2002; Crowl et al., 2008）。此外，心理適應的指標上，無論是家長或是子女的自陳資料亦無明顯差異（Crowl et al., 2008）。

分析學術社群共識的研究，也和 Mike Allen 與 Nancy Burrell（2002）、Alicia Crowl、Soyeon Ahn 與 Jean Baker（2008）的整合分析結果相似。Jimi Adams 與 Ryan Light（2015）以集群分析（cluster analysis）檢視研究社群的共識，透過文獻引用指標呈現學術社群對於此議題看法的歧異程度，指標分數越高，表示學術社群看法的歧異

1 唯一的差異是親輩自陳的親子關係品質，Crowl 等（2008）研究發現彩虹家庭親輩自陳的親子關係品質，優於異性家庭親輩自陳的親子關係品質，然而子輩自陳的親子關係品質兩類家庭並無差異，顯示兩類家庭親子關係品質沒有穩定的不同。

性越大。Adams 與 Light 透過比對時間軸、指標分數與高引用文獻，指出學術社群在此議題上看法的幾個趨勢。第一，學術社群的歧異指數逐年降低，在 2005 年後趨於平緩。第二，早期研究（1985 年前）通常為小樣本研究，研究證據尚未呈現清楚樣態，有些研究顯示彩虹家庭子女要因應家長離婚的家庭變動，因此表現較差。到了 1990 年，研究社群比較彩虹家庭子女與單親家長的子女，爬梳出家長性傾向認同對於子女的影響，共識逐漸形成。這個階段研究的彩虹家庭子女大多是在原異性婚姻瓦解後撫養的子女，缺少透過領養或人工生殖的子輩，加上考慮到這些子女經歷過家長婚姻的瓦解，因此比較對象大多是（異性戀）單親家庭的子女。研究者在釐清婚姻瓦解導致的家庭改變與家長性傾向認同為不同因素後，研究社群的研究結果漸趨一致，即家長的性傾向認同與子女表現無關。最後兩個階段（2000 年與 2010 年）亦延續前期家長性傾向認同與子女的發展無關的研究共識，研究中逐漸納入彩虹家庭中的成年子女，以及自小生長於彩虹家庭的子女（無經歷家庭的瓦解），比較對象則改為預設型態家庭。

研究者在不同年代，逐步釐清影響彩虹家庭的關係品質、家長與子女表現的因素，並且開始有共識。不過，仍然有少數研究者批評這些彩虹家庭研究的限制，包括非代表性樣本、小樣本研究、缺乏比較對象、矛盾的證據、缺乏長期結果的資料、對子女結果評估的指標太狹隘等（Marks, 2012）。本研究採取整合分析蒐集的證據，恰可檢視並回應這些少數研究者的批評。過去研究者雖然曾經進行整合分析，但未檢驗能夠解釋效果量變異的因素（即調節變項分析，moderator analysis），十分可惜。本文針對這些研究者的批評，深入檢視調節變項分析結果，呈現相較於過往整合分析研究的原創性貢獻。

首先，本研究檢視研究發現是否受到樣本的地區代表性影響，

亦即檢視地區代表性，而非性傾向樣本的代表性對於效果量的影響。代表性樣本指的是透過母群體中個別成員的紀錄（稱為抽樣架構，sampling frame），並經過隨機抽樣由抽樣架構取得的樣本（如 de Leeuw, Hox, and Dillman, 2008）。例如，從某學年大學生的註冊資料（即抽樣架構），經過隨機抽樣可以取得大學生的代表性樣本。然而，目前沒有記錄民眾性傾向認同的登錄資料，因此沒有性傾向認同的抽樣架構，研究者不只無法取得同性戀認同者的代表性樣本，也無法取得異性戀認同者的代表性樣本。許多研究者直接將全國性或地區性的代表性樣本等同於性傾向認同的代表性樣本，是基於異性戀認同者為社會多數的前提，然而，這些樣本或許可以大致代表異性戀認同者，但直接推估為同性戀認同者的代表性樣本則有很大問題，因為同性戀認同者可能不願或沒有被抽選參與研究，這就整體樣本而言雖然是微小的誤差，但在屬於少數的同性戀認同者上，誤差則很大。

關於使用全國性或地區性代表性樣本的發現是否與非代表性樣本的發現不同，本整合分析將提供證據，檢視在全國性或地區性代表性樣本的兩類家庭比較，與非代表性樣本的比較結果是否有差異。如果兩者有差異，則兩類家庭比較的效果量應有明顯的差異（即變異程度高），且樣本特性應能解釋這些效果量的變異程度。換句話說，若對代表性樣本的批評有道理，樣本是否有全國性或地區性代表性應是顯著的調節變項，會影響兩類家庭的比較結果。

再者，本研究納入晚近彩虹家庭研究以增加整合分析的研究個數，降低統計檢定力（statistical power）不足對於研究結果的限制。由於彩虹家庭研究進行不易，樣本通常不大，加上兩類家庭樣本招募的管道可能不同，有些研究中並沒有納入比較對象。目前的學術社群共識是家長性傾向認同與子女的發展無關，但若彩虹家庭研究的樣本

都很小，可能會有統計檢定力不足的問題，導致就算存在差異也偵測不出來。此外，評估家庭的功能或子女的發展需要有比較基準，因為這些評估的絕對分數多半不具有意義，未納入比較對象將限制研究發現的延伸性（如客觀數據代表的意義、數據在不同時間點增減代表的意涵）。

本研究透過整合分析研究方法回應並解決彩虹家庭研究樣本太小的限制。一般量化研究者以統計顯著性作為判斷依據，但統計顯著性端視於效果量的強度（如差異程度）、樣本數（偵測的敏感程度）、與做出統計顯著與否可能犯錯的機率值（俗稱第一類錯誤率，Type I error），因此小樣本的研究會因為偵測的敏感程度不足，不容易偵測到差異。不過，整合分析針對的是效果量（即實質差異），可以避免小樣本造成統計不容易顯著的偏差（Johnson and Eagly, 2014）。

透過整合分析研究方法亦可回應彩虹家庭研究缺乏比較對象的批評。整合分析學者系統性地搜尋文獻資料庫，篩選出符合關鍵字的實徵研究，針對有比較對象的彩虹家庭研究進一步分析比較。Allen 與 Burrell（2002）、Crowl 等（2008）曾分別進行整合分析研究，Allen 與 Burrell 納入 12 個兩類家長的比較，並且包含 11 個兩類家庭子女的比較；Crowl 等（2008）則納入 64 個兩類家長／子女的比較。她們的研究結果顯示，即使不是所有彩虹家庭的研究都納入比較對象，仍有相當多的研究納入比較對象。這些研究發現兩類家庭的表現大同小異。

此外，要評估兩類家庭的研究結果是否存在矛盾，學界尚無共識（Marks, 2012），亦可透過整合分析中的同質性檢驗（homogeneity test）進行評估。同質性檢驗判斷各項效果量強度的差異，其中顯著的同質性檢驗顯示不一致的研究證據，亦即這些效果量差異太大並非

反映相同的現象（以抽樣的概念來解釋，即效果量並非來自於同一個母群體）。然而，無論是 Allen 與 Burrell（2002）或 Crowl 等（2008）的研究，大致上都發現這些效果量是同質的，即親子關係品質、子輩的認知發展、性別認同、性傾向認同、心理調適等，在兩類家庭的比較中都沒有顯著的差異。只有在性別角色行為上，Crowl 等的研究發現同質性檢驗是顯著的。以上結果顯示，除了性別角色行為外，其他兩類家庭在各項檢驗上，證據都呈現一致，沒有所謂矛盾或不一致的研究發現。本研究則進一步蒐集晚近的研究，重複驗證過往整合分析的結論，並且檢視如果檢驗的指標有異質性，可能解釋變異情況的因素是什麼。

整合分析整體檢視的諸多指標，亦反駁 Marks（2012）認為彩虹家庭研究對子女結果評估太狹隘的批評。這些變項包括親子關係品質（Allen and Burrell, 2002; Crowl et al., 2008）、子輩的認知發展（Allen and Burrell, 2002; Crowl et al., 2008）、性偏好（Allen and Burrell, 2002; Crowl et al., 2008）、性別認同發展（Crowl et al., 2008）、性別角色態度（Crowl et al., 2008）、對生活的滿意度（Allen and Burrell, 2002）與心理調適（Crowl et al., 2008），顯示彩虹家庭研究檢驗範疇的廣泛。

少數批評者亦質疑彩虹家庭子女的資料缺乏長期效果的檢視。然而，這個問題不只存在於彩虹家庭研究，研究者要對家庭進行長期追蹤，需要仰賴參與者長期的配合，以及龐大的研究資源與團隊支持，因此相關的研究資料較少。不過，目前美國的全國性女同性戀家庭貫時性研究（National Longitudinal Lesbian Family Study）從 1970 年代追蹤至今，橫跨三十餘年，最近一篇針對同／異性家長子女的成年資料顯示，兩類家庭子女大致相仿（Gartrell, Bos, and Koh, 2018）。要檢

視彩虹家庭與預設型態家庭對於子女的長期影響，除了使用貫時性研究外，也能在整合分析研究中檢視子女年齡是否影響兩類家庭比較的結果，以了解彩虹家庭對於子女的長期影響。貫時性研究執行困難，樣本數耗損率高，因此在證據的檢視上往往有統計檢定力不足的限制；過往的整合分析並未檢視子女年齡與家庭比較結果的關聯，亦無法回答這項疑慮。

最後，國際學界最近一次針對兩類家庭比較的整合分析研究已經過了十年，社會氛圍已大幅轉變，在這個階段重新進行整合分析，具有特殊意義。鑑於現今一些國家已提升對於同性伴侶的保障，彩虹家庭的子女不再是同性伴侶在過往異性婚姻中的後代，也包括同性伴侶透過領養或人工生殖方式而擁有的後代，²顯示彩虹家庭質上的改變。本研究相較於過往彩虹家庭實徵研究與整合分析研究，有幾點突破與延伸。第一，社會氛圍的改變使得越來越多彩虹家庭領養子女或進行人工生殖，領養與人工生殖的家庭在與預設型態家庭的比較上較為相當（同為領養者或進行人工生殖者），值得以整合分析方法進一步關注與了解，但個別彩虹家庭實徵研究有樣本數過少，以至於統計檢定力有限的限制，過往整合分析又缺乏此類調節變項分析的檢驗，此為本研究的原創貢獻之一。第二，領養與人工生殖家庭的子女種族大多不是白人，可以檢視兩類家庭比較的結果在不同子女種族上是否有差異。過往的彩虹實徵研究未能檢視子女種族是否影響家庭比較結果，而過往整合分析的研究因為樣本數不大，且效果量多呈現同質，使得研究者未進行調節變項分析，因此無法探討子女種族是否與家庭比較結果有關，殊為可惜。調節變項分析在比較不同條件下效果量的

2 如 2010 年的美國普查資料顯示，同性伴侶繼親或領養比例達 21.2%，為預設型態家庭的四至五倍（Lofquist, 2010）。

大小是否有差異，可以進一步了解彩虹家庭的功能、家長與子女表現。舉例來說，婚姻平權的辯論中，一些反對方質疑將歐美研究發現應用在台灣的適用性，針對這一點，透過調節變項分析，若發現彩虹家庭與預設型態家庭的相似性僅在白人子代，或僅在特定文化社會背景下，則可以支持這項質疑。反之，若調節變項分析發現兩類家庭的相似性在不同種族背景的子代，或在不同社會文化下都存在，則研究結果在台灣的適用性高（顯示生理、社會影響兩類家庭差異的程度都不高）。另外，本研究亦將比較同性父親與同性母親在家庭功能、子女表現上是否有差異，以檢視反方意見的疑慮是否有證據支持。

綜而言之，本文採取整合分析的取徑，檢視兩類家庭的家庭功能、子女表現的異同，並且透過同質性檢驗檢定效果量的變異情況，以調節變項分析檢驗不同研究特性與樣本特徵對於效果量的影響。

三、研究方法

本研究使用整合分析，系統性地搜尋國際既有研究，並且透過效果量估計與調節變項分析，檢視下列三個問題。第一，兩類家庭在比較指標上是否有差異，若效果量顯著大於零表示彩虹家庭的表現優於預設型態家庭，若效果量顯著小於零表示預設型態家庭的表現優於彩虹家庭；若效果量未與零有顯著差異則表示兩類家庭一樣好。第二，透過同質性檢驗評估效果量強度的差異，若同質性檢驗不顯著表示不同樣本的效果量強度一致，效果量的差異為取樣誤差；若同質性檢驗顯著，則表示不同樣本的效果量不一，解讀整體平均效果量要很小心，可能只有在特定條件下才有此效果量。第三，透過調節變項分析，檢驗樣本或研究特性對於效果量的影響。換句話說，調節變項分

析可釐清研究發現的範疇，即釐清上述第二項的特定條件。由於我國目前還沒有大型的彩虹家庭研究，若能透過這樣的整合分析爬梳子女種族、研究特性對於效果量的影響，有助於提升國人對於相關研究的了解，並且鼓勵學者從事這方面的研究。

(一) 樣本的搜尋與收錄標準

本研究於2017年底針對 PsycInfo、google scholar 資料庫與質性回顧文章（如 Marks, 2012），以三組關鍵字（“same sex”、“gay*”、“lesbian*”）、（“heterosexual*”）與（“Parent”或“Children”）的交集搜尋相關研究。收錄文章標準包含：（1）需包含一個比較的標準，如異性關係瓦解後的單親家庭或異性伴侶家庭。（2）除了性傾向與性別認同外，其他結果變項需呈現可用以判定優劣的評估變項（如，內外化問題、認知表現、關係品質），若只呈現不同樣態但無優劣評估的變項則不納入分析，如家長與子女玩玩具時的不同互動行為樣態（稱為共玩類型）。（3）資料需呈現可計算效果量的比較資料，如相關法、*t* 檢定、*F* 檢定、平均數標準差、卡方檢定或 *p* 值（Lipsey and Wilson, 2001）。相同樣本不同評估變項採取分別登錄，分別計算平均效果量、進行同質性檢驗與調節變項分析。若為貫時性研究的資料，同一個時間點、同一種比較僅納入一次，不同時間點相同比較的資料則記錄為相同樣本的不同時間點資料。若是同一個樣本在同一個時間點提供一個以上同樣類型的比較（如家長與子女分別評估的親子關係），進行平均整理，以避免同一個樣本、同一類型的指標有兩個以上的效果量，違反獨立性假設。舉例來說，一篇文章中同時有兩類家庭自陳的家長壓力、親輩與子輩分別自陳的親子間關係，若原始研究者的結

果可以區分出兩類家庭母親與父親各自的測量結果，在本研究則視為兩個樣本，即兩類家庭母親的比較與兩類家庭父親的比較。此外，由於分別有親輩家長壓力、親輩與子輩的親子間關係測量，分別登錄為兩個不同效果量（家長壓力、親子關係）。親輩與子輩的親子關係分別估算出效果量後進行平均。在後續分析與檢驗則各自針對登錄的效果量類型進行分析，親輩家長壓力效果量與其他樣本的親輩家長壓力效果量比較差異檢驗，親子間關係效果量也進行同樣的處理。

（二）效果量的計算

效果量（ g ）的計算採兩類家庭的分數相減，除上其標準差，並在後續使用校正公式將效果量轉換成無偏差的效果量（ d ），以避免由於小樣本而產生高估效果量的問題（Lipsey and Wilson, 2001）。由於有些結果高分表示表現較好，有些結果高分表示表現較差，為了避免造成後續比較與理解的困擾，以正的效果量表示彩虹家庭／家長／子女表現優於預設型態家庭／家長／子女表現。整體效果量的計算採隨機效果模式，以評估取樣誤差；若整體效果量為同質，調節變項分析採固定效果模式，檢視研究與樣本特性和效果量的關聯；若整體效果量為異質，採隨機效果模式（在此為混合模式，效果量隨機效果、調節變項固定效果），檢視研究與樣本特性和效果量的關聯。樣本數（ k ）小於十的效果量類型，不進行調節變項分析。

（三）結果變項

參考 Allen 與 Burrell（2002）、Crowl 等（2008）的整合分析結

果，結果變項分別為家庭支持體系（包含家長關係、親子關係、與他人的關係）、家長壓力與精神狀態、家長的性別刻板印象（包括家庭中的性別分工）、子女的性別刻板印象、子女認知表現（如智力成績、學校成績）、子女內化問題、子女外化問題、子女受害經驗、子女其他的問題（如用藥、未成年性行為）。此外，納入性別認同的混淆與子女的性傾向認同兩項指標。

（四）研究特性與樣本特性編碼

本研究記錄文獻發表的年代、資料蒐集的年代、資料蒐集的國家、是否是貫時性研究、是否是地區性或全國性代表性樣本、是否使用隨機抽樣、是否使用相同的蒐集管道、是否為配對樣本、人工生殖樣本比例、領養樣本比例；以及彩虹家庭子女的種族（白人比例）、年齡與性別比例。文獻中若陳述資料蒐集的年代，直接登錄年代，並註明為實際舉報結果；文章若未陳述資料蒐集的年代，依據前述有實際陳述資料蒐集年的研究（樣本數， $k = 19$ ）之資料蒐集年與出版年差異的中位數（七年）估算。分析時若資料蒐集年為顯著的調節變項，則分別檢視此結果是否在實際舉報的研究與含估算的整體研究都穩定地存在。此外，有些地區性或全國性代表性樣本沒有使用隨機抽樣（如針對特定區域的所有人），因此另有隨機取樣與否的編碼。配對樣本的判定為文獻中說明為配對樣本，若未說明則檢視兩類家庭在子輩年齡、親輩社經地位、親輩教育程度上無差異者，屬於配對樣本。樣本特性都以彩虹家庭的資料登錄，若文獻中說明樣本中的人工生殖樣本、領養樣本比例，依其比例登錄；若未說明則登錄為0。針對其中一部分的文章（ $k = 35$ ），由筆者之外的獨立編碼者針對研究

特性與樣本特性編碼，編碼結果與筆者之編碼一致性高，組內相關介於 .58~1.00，平均為 .85。編碼不一致處則由筆者回到原文章查找相關資訊，確認編碼。

(五) 樣本

本研究含 38 個研究，66 個樣本比較（參見參考文獻的研究編碼與樣本編碼），都是已發表的文獻，發表年代介於 1980 到 2017 年（參見表一），約有半數研究發表於 2008 年後，也就是最近一次整合分析研究（Crowl et al., 2008）之後。由於許多貫時性研究是在不同時間點測量不同變項，不同時間點、相同變項的追蹤資料仍屬少數（ $k < 5$ ），因此僅在結果部分描述說明，不進行資料分析比較。研究樣本蒐集國家以美國（46 筆）、荷蘭（6 筆）的資料最多，後續將國家別分為美洲、歐洲與其他三大類。樣本使用相同的蒐集管道有 47 筆（71.2%），絕大多數的資料比較配對樣本（58 筆）。所有經不同管道蒐集的樣本均為配對樣本（19 筆）。

在樣本特性的部分，總人數為 1,855 位彩虹家庭家長／子女、46,896 位預設型態家庭家長／子女（參見表一）。研究文獻中使用單親的比較對象有 14 筆，針對同性父親的樣本有 12 筆。彩虹家庭子代為人工生殖或領養約各占兩成五（參見表一）。彩虹家庭子女為白人比例介於 17% 到 100%，男女比例相仿，年齡介於 2.0 歲到 23.5 歲，平均約八歲（參見表一右側欄位）。

表一：整合分析整體樣本特性的描述性說明

研究特性	值	樣本特性	值
出版年區間	1980~2017	總人數	
平均出版年	2004	異性家長／子女	46,896
出版年中位數	2008	同性家長／子女	1,855
國家 ^a		人工生殖比例	25.4%
美國	46 (69.7%)	領養比例	27.6%
荷蘭	6 (9.1%)	針對同性父親樣本	12 (18.2%)
英國	5 (7.6%)	比較家長	
比利時	4 (6.1%)	單親家長	14 (21.2%)
貫時性研究	24 (36.4%)	子輩白人比例	17%~100%
配對樣本	58 (87.9%)	子輩性別比例 (男)	51.4%
樣本蒐集來源相同	47 (71.2%)	子輩年齡範圍	2.0~23.5
代表性樣本	15 (22.7%)	子輩平均年齡 (標準差)	8.31 (4.46)

^a另有以色列、義大利、澳洲等國的研究。

四、研究結果

(一) 平均效果量與調節變項分析結果

本研究的結果重複驗證了 Allen 與 Burrell (2002)、Crowl 等 (2008) 的整體平均效果量研究發現，兩類家庭功能大致相同，整體平均效果量參見表二。兩類家庭的支持體系沒有差異 (參見表二、圖一)，不過同質性檢驗顯示家庭支持體系的效果量變異情況較大 (參見表二第四欄)。進一步執行調節變項分析，檢視方法變項與樣本特性對效果量的預測力，發現執行研究的地區有差異，相較於美洲與歐洲地區彩虹家庭的支持體系優於預設型態家庭 ($d+ = 0.10$, 95% 信

表二：整體平均效果量

結果變項	樣本	平均效果量 (95%信賴區間)	Q ^a	父親	家長類型	母親	子女類型 人工或領養 % ^b	子女種族 白人比例 ^b
家庭支持體系 ^c	41	0.08 (-0.02, 0.19)	67.95**	0.21 (-0.03, 0.45)	0.05 (-0.07, 0.16)	0.05 (-0.07, 0.16)	<i>ps</i> > .24	-0.07 (0.20)
家長壓力/情緒穩定程度	19	-0.04 (-0.12, 0.05)	15.11	0.07 (-0.15, 0.29)	-0.06 (-0.15, 0.04)	-0.06 (-0.15, 0.04)	<i>ps</i> > .56	0.10 (0.34)
家長性別刻板印象	20	0.41 (0.27, 0.54)****	27.30	0.62 (0.22, 1.01)	0.38 (0.24, 0.52)	0.38 (0.24, 0.52)	人工0.34 (0.16)*	-0.23 (0.34)
子女性別刻板印象	22	0.30 (0.18, 0.42)****	23.84	0.11 (-0.13, 0.35)	0.36 (0.22, 0.51)	0.36 (0.22, 0.51)	<i>ps</i> > .51	-0.38 (0.44)
子女的認知表現	17	-0.04 (-0.17, 0.09)	15.71	N/A	-0.04 (-0.17, 0.09)	-0.04 (-0.17, 0.09)	<i>ps</i> > .74	-0.07 (0.35)
子女的内化問題 ^d	29	0.08 (-0.09, 0.24)	92.43****	0.43 (0.02, 0.84)	0.01 (-0.17, 0.19)	0.01 (-0.17, 0.19)	<i>ps</i> > .39	0.02 (0.47)
子女的外化問題	27	-0.02 (-0.10, 0.06)	24.99	-0.02 (-0.23, 0.18)	-0.02 (-0.11, 0.07)	-0.02 (-0.11, 0.07)	人工0.18 (0.09)*	0.20 (0.21)
子女的自我評估	20	-0.02 (-0.14, 0.10)	22.41	N/A	-0.03 (-0.16, 0.11)	-0.03 (-0.16, 0.11)	領養0.54 (0.29)+	-0.16 (0.39)
子女受害經驗 (如霸凌)	6	-0.12 (-0.34, 0.10)	3.81	N/A	N/A	N/A	N/A	N/A
子女的性別認同	6	0.08 (-0.16, 0.32)	0.76	N/A	N/A	N/A	N/A	N/A
子女的性傾向認同	5	-0.24 (-0.51, 0.02)	2.63	N/A	N/A	N/A	N/A	N/A
子女其他問題 (如未成年 性行為、用藥行為)	11	-0.01 (-0.14, 0.13)	13.54	N/A	-0.01 (-0.14, 0.13)	-0.01 (-0.14, 0.13)	<i>ps</i> > .84	-0.35 (0.53)

註：若效果量顯著大於零（即效果量大於零且信賴區間不包含零），表示彩虹家庭的表現優於預設型態家庭；若效果量顯著小於零，表示預設型態家庭的表現優於彩虹家庭；若效果量未與零有顯著差異（即信賴區間包含零），表示兩類家庭一樣好。N/A因樣本數太少，未進行分析或無法估算。

^a同質性檢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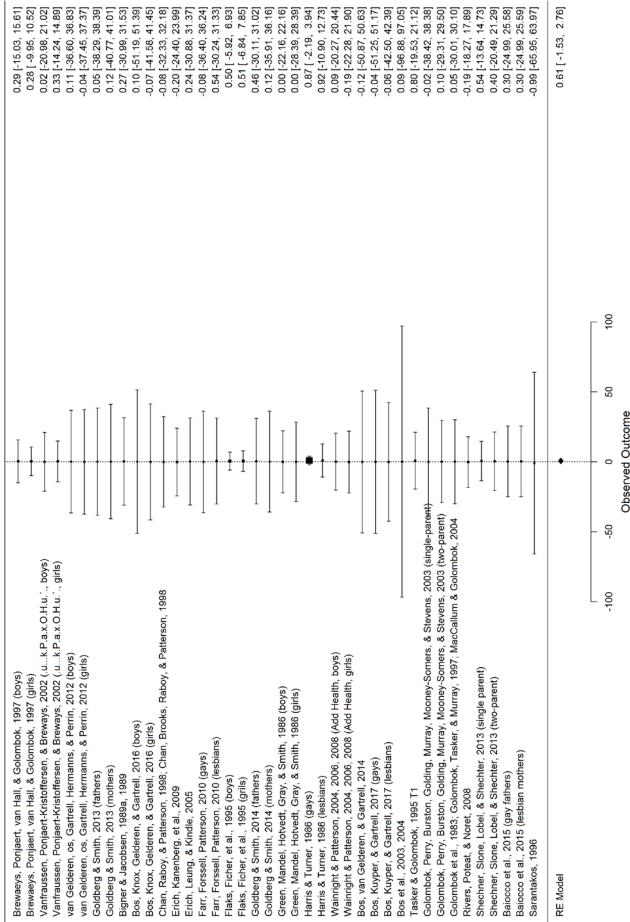
^b未標準化係數與標準誤，若顯著，則控制其他顯著之方法或樣本變項。

^c包括親子關係、同儕關係、親友關係。

^d家長調節變項分析達臨界顯著 ($p = .06$)，但此結果變項中父親樣本只有四筆。

**** $p < .0001$; ** $p < .01$; * $p < .05$; + $p < .07$

圖一：家庭支持體系效果量分布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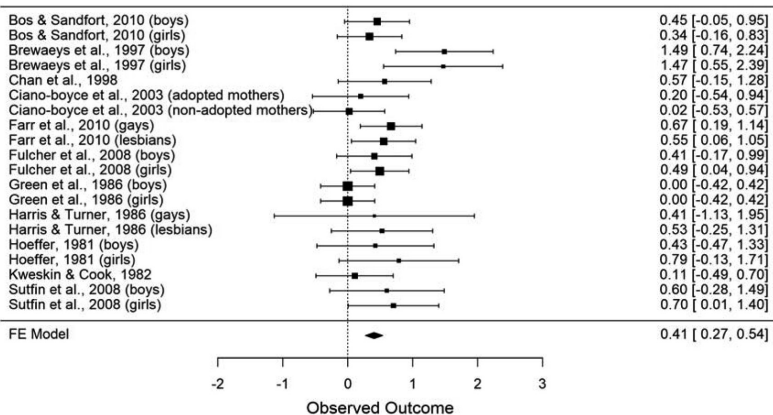
註：方塊越大，表示樣本數越大；樣本數越大，誤差範圍越小（即方塊兩側的誤差線）。最右側數字為效果量及效果量的信賴區間，若效果量顯著大於零（即信賴區間不包含零），表示彩虹家庭的表現優於預設型態家庭；若效果量顯著小於零，表示預設型態家庭的表現優於彩虹家庭；若效果量未與零有顯著差異（即信賴區間包含零），表示兩類家庭一樣好。

RE model：因同質性檢驗顯著，採隨機效果模式。

賴區間為0.01~0.19, $p = .02$, $k = 38$), 其他地區的研究(以色列、澳洲)發現預設型態家庭的支持體系較佳($d+ = -0.38$, 95% 信賴區間為 $-0.70 \sim -0.06$, $p < .001$, $k = 3$), 不過因為其他地區的樣本數很少, 有待後續研究進一步確認。此外, 與單親家長的支持體系相比, 彩虹家庭的支持體系較佳($d+ = 0.37$, 95% 信賴區間為 $0.09 \sim 0.66$, $p = .01$, $k = 7$); 與非單親家庭相比無明顯差異($p = .52$, $k = 34$)。同時檢視地區與單親家庭比較, 兩者皆為重要調節變項, 且控制兩變項後, 殘餘的變異情形不顯著($p = .34$)。

兩類家庭家長的壓力與情緒穩定程度無差異(參見表二第四列), 且同質性檢驗未顯著, 顯示不同樣本間的效果量變異不大。無論是針對父親或母親, 配對樣本或非配對樣本, 或是領養/人工生殖, 這些樣本特性都與兩類家長的壓力與情緒穩定差異無關(參見表二)。

圖二：家長性別刻板印象效果量分布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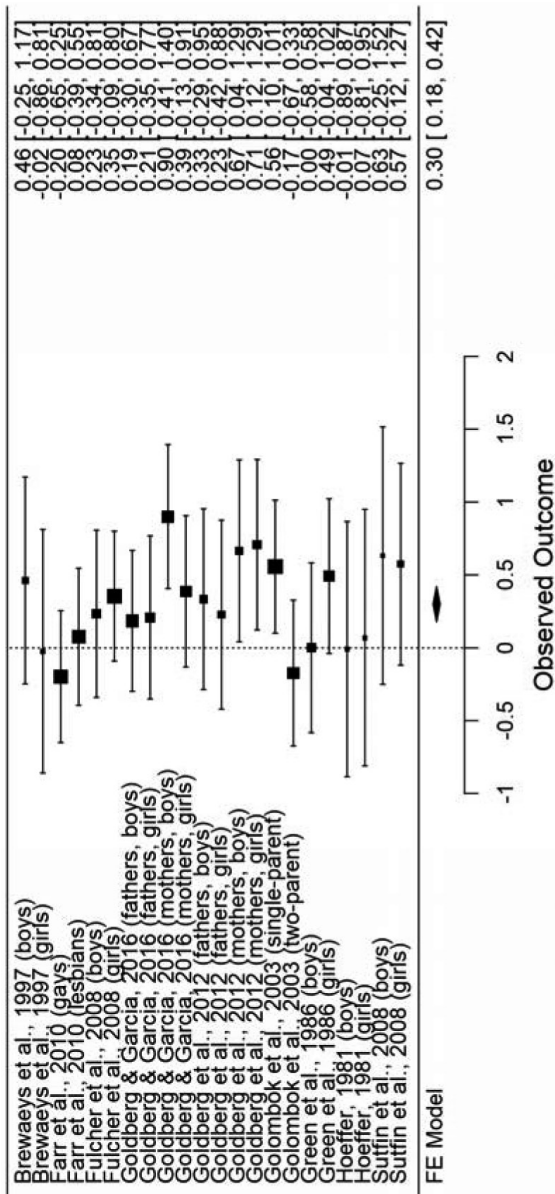


註：方塊越大，表示樣本數越大；樣本數越大，誤差範圍越小（即方塊兩側的誤差線）。最右側數字為效果量及效果量的信賴區間。效果量解讀參見圖一。

FE model：因同質性檢驗未顯著，採固定效果模式。

家長與子女的性別刻板印象則有家庭類型的穩定差異（參見表二第五列、第六列）。相較預設型態家庭的家長與子女，彩虹家庭的家長（見圖二）與子女（見圖三）比較不會用生理性別去框架或限制行為與選擇（如職業期待、房間佈置）。此外，檢視方法特性發現，雖然彩虹家庭家長的性別刻板印象較小，但此差異在不同類型樣本有程度之別。若樣本是地區性或全國性代表性樣本，兩類家庭家長的刻板印象差異會較大（ $d+ = 1.48$, 95% 信賴區間為 0.90~2.06, $p < .0001$, $k = 2$ ），而非代表性樣本的兩類家庭性別刻板印象差異較小（ $d+ = 0.35$, 95% 信賴區間為 0.21~0.48, $p < .0001$, $k = 18$ ）。此外，若比較對象為單親家長，兩類家庭的性別刻板印象程度差不多（ $p = .21$, $k = 7$ ），比較對象若非單親家長，則有明顯差異（ $d+ = 0.53$, 95% 信賴區間為 0.37~0.70, $p < .0001$, $k = 13$ ）。貫時性研究設計招募的兩類家長差異較大（ $d+ = 0.66$, 95% 信賴區間為 0.43~0.88, $p < .0001$, $k = 6$ ），非貫時性研究亦有明顯的差異（ $d+ = 0.28$, 95% 信賴區間為 0.11~0.44, $p = .001$, $k = 14$ ）。檢視樣本特性發現，若樣本中人工生殖子女的比例較高，兩類家庭家長的性別刻板印象差異也較大（未標準化迴歸係數， $b = 0.34$, $p = .03$, 參見表二）。控制上述變項後，家長性別刻板印象差異的效果量變異情況很小（ $p = .91$ ），且代表性樣本為最重要的調節變項；子女的性別刻板印象差異則與方法或樣本特性無關。

圖三：子女性別刻板印象效果量分布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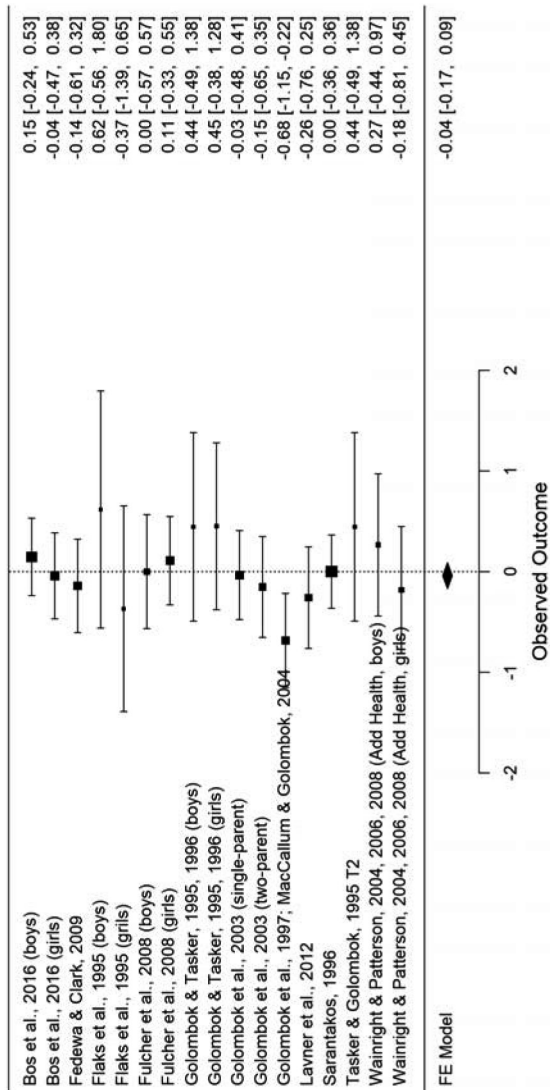


註：圖形標註解讀參見圖一、二。

兩類家庭子女的認知表現（包含學校成績）一樣好（參見表二第七列，圖四）。進一步檢視樣本特性對於效果量的預測力，發現子女的年齡越大，兩類家庭的差異越大（ $b = 0.03, p = .03$ ，參見圖五），例如在十歲左右，兩類家庭沒有差異（本研究在此指標有年齡資料的文獻樣本，平均年齡為 10.8 歲）。簡單而言，年紀較小，預設型態家庭子女的優勢較大，年紀較大，彩虹家庭子女的優勢較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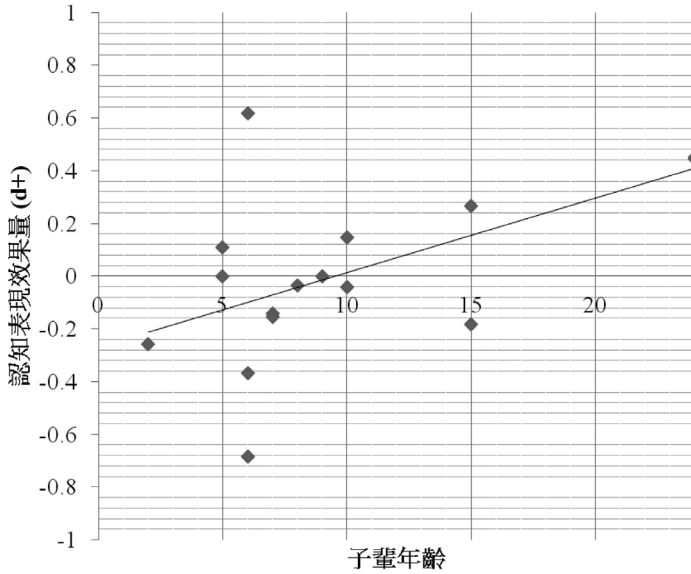
兩類家庭子女的內化、外化問題沒有差異（參見表二第八、九列），不過，同質性檢驗發現子女的內化問題違反同質性假定，代表樣本間效果量的差異較大。檢視研究與樣本特性發現，內化問題與外化問題有高相關（ $r = .47, p = .02, k = 24$ ），以及樣本中同性父親的比例越高，其子女內化問題越少（ $b = 0.42, p = .06$ ，參見表二同性父親、母親樣本的結果）。同時控制以上兩個變項（外化問題、同性父親比例）後，兩變項皆為重要的調節變項。控制這兩個重要調節變項後，殘餘的變異量很小，未推翻同質性假定（ $Q_w [21] = 23.46, p = .32$ ）。外化問題雖然效果量具同質性，但樣本特性仍影響結果發現。樣本若（1）採隨機抽樣、（2）為代表性樣本或（3）為同一招募管道，效果量都比較低（即兩類家庭較類似， $bs < -0.17, ps < .05, k = 27$ ）。此外，子輩的人工生殖比例越高，兩類家庭的差異越大（ $b = 0.18, p < .05$ ），控制個別顯著的調節變項後，殘存的變異情況皆不顯著（ $ps > .68$ ）。不過，以上這些調節變項解釋了共同的變異情況，共同放入後則無明顯優勢的調節變項，有待未來研究進一步探討。其他樣本特性無顯著預測力。

圖四：子女的認知表現效果量分布圖



註：圖形標註解讀參見圖一、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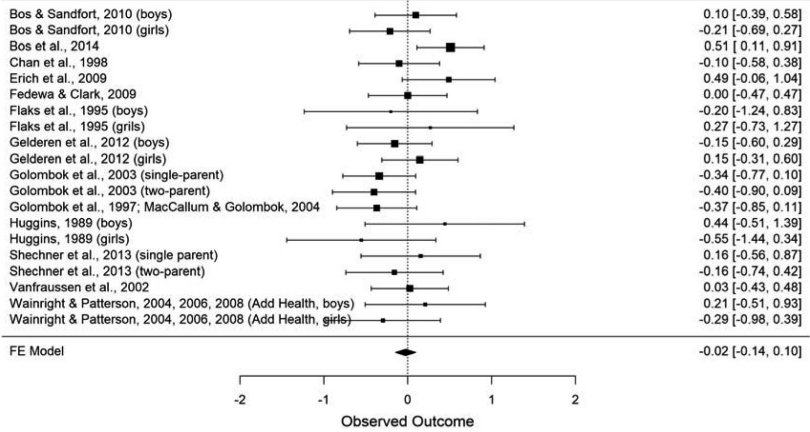
圖五：年齡與認知表現效果量的趨勢圖



註：效果量解讀參見圖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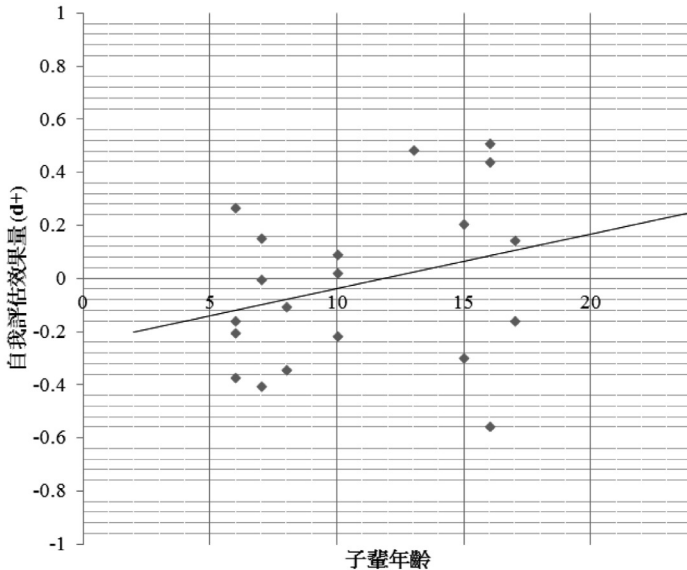
兩類家庭子女的自我評估沒有差異（參見表二第十列，圖六）。進一步檢視樣本特性的預測力，顯示兩個重要的調節變項。第一個調節變項是資料蒐集年，越晚近的資料，彩虹家庭子女的自我評價越高，越早期的資料，預設型態家庭子女的自我評價越高。檢驗實際提供資料蒐集年的研究（ $b = 0.02$ ）與含預估資料蒐集年的研究（ $b = 0.02$ ），兩者的未標準化迴歸係數相同。第二個調節變項是子女年齡，年紀增長後，兩類家庭的差異越大（ $b = 0.03, p = .02$ ，參見圖七），彩虹家庭子女在年紀增長後，自我評估較預設型態家庭子女好，與認知能力的評估趨勢相仿。不過，這兩個變項解釋的變異量相仿，共同放入後則無明顯優勢的調節變項，其他樣本特性無顯著預測力。

圖六：子女的自我評估效果量分布圖



註：圖形標註解讀參見圖一、二。

圖七：年齡與自我評估效果量的趨勢圖



註：效果量解讀參見圖一。

最後四個結果變項的樣本數都不多，研究結果也顯示兩類家庭子女沒有明顯差異。此外，由於效果量同質，不再進行調節變項分析。

(二) 貫時性資料

本研究分析的文獻中，有四組研究者提供不同時間點、相同變項的貫時性資料，以下介紹這四個貫時性研究團隊的成果，並依據子女年齡依序介紹。

第一、二組研究者針對學齡前兒童，分別評估性別刻板印象行為與問題行為。Abbie E. Goldberg 與 Randi L. Garcia (2016) 追蹤95個同性雙親家庭(52個女同、43個男同)與70個異性雙親家庭，首位領養子女的性別刻板印象行為，從約三歲追蹤到六歲。這些子女平均領養的年齡為10個月，種族多元(半數以上為有色人種)。研究者使用學齡前活動量表(Pre-School Activities Inventory)由家長填答子女的活動與遊戲，分數越高表示越男性化，分數越低表示越女性化。結果發現領養子女的性別刻板印象行為(男孩58.88，女孩37.99)與一個常模樣本相仿(男孩61.66，女孩38.72；Golombok and Rust, 1993)。研究者採取多階層模式的分析(共同命運成長模式)，發現男女孩的性別刻板印象化程度有差異(男孩較男性化、女孩較女性化)，在不同類型家庭皆然。不過，女同家庭中男女孩的性別刻板印象行為差距較小，符合本研究中彩虹家庭子女的性別刻板印象較低的結果。此外，在不同家庭類型中，隨著年齡增長，男孩男性化的程度都越高，女孩則無顯著的差異，可能反映社會上對於男性性別界線的僵固程度較高。

第二組研究者為 Justin A. Lavner、Jill Waterman 與 Letitia Anne

Peplau (2012)，他們針對美國洛杉磯地區 82 位高風險兒童被領養後的認知表現與問題行為，進行三個時間點（兩個月後、一年後、兩年後）的測量。這些被領養的小孩多數為有色人種，約有 51% 為跨種族領養，且出生時的藥物檢查顯示大多數（89%）有胎期藥物接觸，被領養的平均年齡為四歲。其中有 60 個異性伴侶家庭、22 個彩虹家庭。彩虹家庭收養的子女在收養時有較多危險因子，包括生物危險因子如胎期藥物接觸、早產；環境危險因子如虐待或忽視，領養後被領養家庭拒絕並送回機構等待第二次領養機會等。透過多階層模式檢視家庭層級與個人層級資料，發現在收養後兩個月，兩類家庭子女在認知表現與外化問題上沒有差異，符合本研究結果。此外，彩虹家庭子女的內化問題較少，隨著領養時間增加，兩類家庭領養子女的認知發展皆有提升，其他指標則無顯著差異。

第三組研究者從子女學齡前追蹤至學齡時期，Rachel H. Farr 與合作者 (Farr, 2017; Farr, Forssell, and Patterson, 2010; Farr and Patterson, 2013) 透過美國五個領養機構招募自小領養（剛出生或幾週內即被領養）的家庭，成功訪問 106 個家庭，五年後回訪成功率達九成（29 個女同性家庭、26 個男同性家庭、41 個預設型態家庭）。領養子女的平均年齡第一波資料時是三歲，第二波資料時是八歲，約有 46% 家庭的子女種族與家長不同。研究者並訪問了 76 位這些子女的老師或安親班協助者。研究者使用階層線性模式檢驗家庭層級（兩類家庭家長）與個人層級變項，對於後續時間點的家庭功能、家長壓力與子女問題行為的預測力。結果顯示，控制了第一個時間點的資料，兩類家庭在家庭功能、家長壓力與子女問題行為上無差異，與本整合分析結論相同（即兩類家庭無明顯差異）。另外，對比兩個時間點的資料可以發現家長壓力與子女問題行為呈現相互影響，無論哪一

類家庭，第一個時間點家長有較高的壓力，在控制第一個時間點子女問題行為後，子女在第二個時間點還是出現較多問題行為。至於在第一個時間點子女有較多問題行為的家庭，在控制第一個時間點的家長壓力、伴侶調適（即家庭功能），在第二個時間點的家庭功能仍較差，顯示家長與子女間有極高的交互影響性。

第四組研究者從子女國小階段追蹤至成年期。Susan Golombok 與合作者（Golombok, Spencer, and Rutter, 1983; Tasker and Golombok, 1995）從1976年開始收案，完成兩類家庭各27個家庭，39個子女的研究。他們的研究剛開始收案時子女平均年齡為9.5歲，1991至1992年進行追蹤研究，先取得母親同意後與子女連繫，共有46位子女同意參與後續追蹤研究（其中25位為女同性伴侶的子女），平均年齡23.5歲。研究結果顯示，成年子女與父母在當時的關係上沒有家庭類型的差異，但與母親伴侶的關係則有家庭類型的差異。此外，子女在回憶青少年時期與成年早期兩個時間點，對於母親伴侶的關係以及對母親認同的感覺，亦有差異。在回憶青少年時期，彩虹家庭子女與母親伴侶的關係較佳（ $M_{\text{彩虹家庭}} = 3.00$ vs. $M_{\text{單親家庭}} = 2.15$ ），且此優勢延續到成年後與母親伴侶的關係（ $M_{\text{彩虹家庭}} = 2.96$ vs. $M_{\text{單親家庭}} = 2.06$ ）。此外，彩虹家庭子女在回憶青少年時期對母親的感覺與單親母親無明顯差異（ $M_{\text{彩虹家庭}} = 2.08$ vs. $M_{\text{單親家庭}} = 2.45$ ），但到了成年早期，彩虹家庭子女對於母親的感覺趨於正向（ $M_{\text{彩虹家庭}} = 3.21$ vs. $M_{\text{單親家庭}} = 2.74$, $p = .04$ ），且提升的程度（ $p < .001$ ）遠大於單親家庭的子女（ $p < .10$ ）。

以上貫時性研究在不同點的資料顯示，兩類家庭的家長與子女大同小異，影響家長與子女的重要因素為家庭功能（如 Farr, 2017; Farr et al., 2010; Farr and Patterson, 2013）與社會氛圍（如 Goldberg and Garcia, 2016）。領養家庭（如彩虹家庭）提供給許多人第二個人生發

展的機會（如 Lavner et al., 2012）。

五、綜合討論

同性伴侶經營家庭，從過往社會中的極少數，在異性婚姻結束後重新開始，到現今透過領養、人工生殖的方式為家庭迎接新生命，彩虹家庭的樣貌越來越豐富。相對地，社會也在改變以提供這些家庭法律的保障與平等安全的環境。然而，在社會改變的過程中，引發部分人士的焦慮與不安，形成社會改變的阻力。本文以整合分析的研究取徑，檢視社會上存有的焦慮與不安是否符合證據發現，以期促進建設性的討論與思考。以下從兩部分深入探討，首先，根據本研究可能有的限制與問題深入說明；其次，檢視研究證據的趨勢以回應社會上可能有的疑慮，並釐清影響家庭、家長與子女的促進與危險因子。

（一）整合分析方法的限制與回應

首先，本研究沒有國內的研究文獻是一大限制。不過，根據本研究的兩點發現，可以預期國外研究發現在國內的適用性。第一，本文檢視不同文化背景對於檢視指標的影響，除了在家庭支持體系發現差異外，在其他檢視的指標上皆無明顯差異。歐美社會對於同性伴侶較友善，同性伴侶的支持體系較預設型態家庭佳，而其他地區（至今尚未通過同性婚姻法的以色列、與文獻出版時尚未通過同性婚姻法的澳洲），預設型態家庭的支持體系優於彩虹家庭，顯示社會氛圍的重要性。不過，雖然家庭的支持體系有地區上的差異，家長與子女的表现指標都沒有地區上的不同，顯示不同家庭以各自的方式因應所遇到

的困難。只要社會氛圍對於彩虹家庭的敵意或不友善可以控制在一定程度內（如本研究對非歐美地區的家庭支持體系的比較結果為小效果量），彩虹家庭有足夠的韌性具有一樣良好的家庭功能。第二，子女的種族比例與檢驗的指標皆無關（參見表二最右列）。換句話說，即使社會氛圍對於同性伴侶的友善程度有差異，或是子女的種族可能有不同的性格基礎，都與兩類家庭的家長或子女表現結果沒有重大的關聯。筆者希望藉由本研究結果，鼓勵並呼籲國內家庭研究者將彩虹家庭納入家庭研究對象，在未來能與國外研究發現對話。

其次，由於整合分析納入不同研究者、不同研究設計、不同材料的資料，可能產生兩個問題。讀者可能納悶納入的研究品質是否影響研究結果？或者質疑不同的研究真的可以比較嗎？本研究因應第一個質疑的處理方式，是將研究特性編碼，進而檢視這些研究特性是否與兩類家庭的比較結果有關。要比較兩類家庭，較佳的研究設計是盡量讓兩類家庭除了伴侶性別組成不同外，其他的指標都相同，筆者依據這樣的原則檢驗資料蒐集的時間與管道（由「樣本蒐集來源相同」編碼檢驗），與兩類家庭的社經地位程度相仿（由「配對樣本與否」編碼檢驗）。在調節變項檢視的家庭、家長、子女九個指標上，「配對樣本與否」未與任何家庭比較指標有關；而「樣本蒐集來源相同」僅在外化問題有顯著關聯，若樣本蒐集來源相同，兩類家庭的比較結果較相近（ $d+ = -0.06$, 95% 信賴區間為 $-0.15 \sim 0.03$, $p = .20$, $k = 22$ ）；若樣本蒐集來源不同，兩類家庭的比較結果有臨界顯著的差異，且彩虹家庭的表現略佳（ $d+ = 0.20$, 95% 信賴區間為 $-0.01 \sim 0.41$, $p = .06$, $k = 5$ ）。以上結果顯示，設計較完善的研究發現和其他研究的發現沒有明顯差異，呈現兩類家庭的相似性遠高於差異性，是個滿穩定的研究發現。本研究因應第二個質疑的回應處理，是在設計研究題目之初就

對檢視的指標設有一定的限制（需反映優劣的指標），並將相同類型的指標以概念歸類，以避免拿橘子與蘋果相比的情況。檢視同質性檢驗的結果（參見表二第四欄）亦可發現，在十二個同質性檢定的結果中，僅有兩個變項有顯著的變異情況。換句話說，在十個檢視的指標中，即使這些研究設計特性不同、樣本特性不同、執行的年代與文化氛圍也不同，其結果仍很穩定，沒有明顯的變異。至於同質性檢驗有差異的兩個指標（家庭支持體系、內化問題），在分別控制重要的調節變項後（家庭支持體系：執行的地區與比較對象是否為單親家庭；內化問題：外化問題的效果量、家長是否為父親），則兩指標就沒有明顯的變異情況了。換句話說，雖然研究者背景不同，研究問題與使用的工具亦有差異，但兩類家庭比較的結果是很穩定的。

最後，本研究未納入未發表文章，難以避免整合分析經常被質疑的抽屜效應（file-drawer problem），因為沒有效果的研究發現可能無法被接受刊登，而這種篩選效果造成高估效果量的偏差。然而，抽屜效應並沒有影響本研究，因為本研究的整體發現即是兩類家庭間無穩定的差異，因此即使加入沒有效果而被收在抽屜的研究，只是讓此無差異的發現更加穩定。

（二）兩類家庭比較趨勢與家庭促進、危險因子的釐清

本研究除了重複驗證多數過往的研究趨勢，也提供了過往整合分析研究未能說明的部分。首先，彩虹家庭父親、母親與預設型態家庭的比較無明顯差異，而 Crowl 等（2008）發現以親輩的觀點，彩虹家庭的親子關係品質較佳，以子輩的觀點來看，親子關係品質無家庭類型上的差異，顯示兩類家庭的親子關係品質無穩定的差異（視評估

者而定)，與本研究的發現相仿。不過，在少數指標上發現有家庭比較的差異，彩虹家庭父親表現較佳（內化問題，參見表二第五欄），包括彩虹家庭父親子女的內化問題較預設型態家庭子女少，彩虹家庭母親子女在這方面則無明顯差異。雖然這些資料量還不大（提供此資料的同性父親樣本只有四筆，共136人），但整體趨勢顯示彩虹家庭父親、母親與預設型態家庭的結果大同小異，即使有差異也是彩虹家庭表現較佳。這說明了親子關係與家庭功能的重要因素是家長對子女投入的心力，而非家長的情慾對象。彩虹家庭父親可能有兩個優勢，一是願意成為父親的同性伴侶投入的心力可能較大，因為這樣的意願與性別社會化過程中女性被認為是子女主要照顧者的內涵不同。舉例來說，Abbie E. Goldberg 與 Julianna Z. Smith（2009）針對收養家庭的研究，發現預期投入照顧子女的彩虹家庭父親與母親沒有明顯差異，都高於預設型態家庭父親，但都低於預設型態家庭母親。此外，Goldberg 與 Smith（2009）比較兩個時間點的家長技巧，發現彩虹家庭父親自覺的家長技巧提升程度最高。最後，彩虹家庭父親常有經濟上的優勢，而彩虹家庭母親的經濟劣勢最大（如 Goldberg and Smith, 2013），如果家庭的經濟狀況或家庭壓力會影響家長的精神狀況，並進而影響子女的內化問題（Conger, Ge, Elder, Lorenz, and Simons, 1994; Goldberg and Smith, 2013），亦可能說明身為彩虹家庭父親子女的優勢。

此外，彩虹家庭家長的分工程度通常和預設型態家庭家長不一樣，大多是兩人一起承擔經濟上的壓力與教育子女的職責（Brewaeyns, Ponjaert, van Hall, and Golombok, 1997; Ciano-Boyce and Shelley-Sireci, 2003），雙方也比較滿意這樣的安排（Farr and Patterson, 2013）。這些研究發現不僅是根據參與者自陳的資料，也來自觀察者客觀評估的家

庭互動與分工 (Farr and Patterson, 2013)。家長對於分工的滿意程度同時預測了子女較低的外化問題 (Farr and Patterson, 2013)，家長分工的公平與滿意程度是另一個促進因子。

除了性別刻板印象的分工外，性別刻板印象越僵固，在心理、社會層面都可能有負面影響。針對中國與美國的研究，都發現性別僵固行為與憂鬱症狀呈正相關，性別僵固行為與友誼品質呈負相關，顯示受到性別刻板印象的僵固行為之適應性較差 (Gupta et al., 2013)。彩虹家庭家長與子女的性別刻板印象程度皆低於預設型態家庭，且兩類家庭的可比較性越高（如代表性樣本、皆為進行人工生殖的家庭），家長的性別刻板印象差異越大，性別刻板印象可說是危險因子。

研究亦發現彩虹家庭子女若是透過人工生殖的方式誕生，外化問題比預設型態家庭子女少，在其他變項上則無明顯差異。這個發現有幾個可能。第一，由於人工生殖的彩虹家庭樣本，比較的對象多是人工生殖的預設型態家庭樣本，人工生殖的兩類家庭的可比較性高於自然生產的兩類家庭，是支持兩類家庭無明顯差異的有力證據。由於自然生產的彩虹家庭子女多半經歷過原生家庭的瓦解，自然生產的預設型態家庭子女則不見得經歷過原生家庭的瓦解（端視研究者挑選的比較對象）。此外，兩類家庭都經歷人工生殖，也使得兩類家庭的主要壓力源類似。透過人工生殖的同性家長與自然產的同性家長亦有些差異，透過人工生殖的同性家長可能對自己的性傾向認同較穩定，或較能抗拒社會上預設的異性戀思維，這種對自己的肯認 (affirmation) 或許亦是教養子女上的優勢。家庭瓦解或家庭關係不和睦對於子女而言，可能是個危險因子。研究發現控制家庭瓦解或遷移的變動因子後，彩虹家庭子女的數學、閱讀表現、內外化問題與傳統預設型態家庭（未經歷家庭瓦解）的子女沒有差異 (Potter, 2012; Potter and

Potter, 2017)。

本研究發現也可以回應一些對於國情不符的質疑。首先，本研究發現不同地區的家庭支持體系有差異，顯示整體社會氛圍的友善程度的確影響到彩虹家庭尋求外援的機會。不過，即便有這樣的差異，兩類家庭在家長與子女表現上則未有明顯差異。這個研究發現說明社會氛圍的確有些影響，使得彩虹家庭可能在與外在環境的連結上較為薄弱，但社會氛圍並未使彩虹家庭就註定有較差的表現。基於客觀環境的限制，不同的家庭會去發揮家庭最大的功能。以台灣單親家庭的研究發現為例，鄭麗珍（2001）比較單親家庭與雙親家庭的子女，並以六個指標評估生活適應狀況，結果發現單親家庭學童與雙親家庭學童在整體的生活適應上沒有差異。在控制學童性別、學級、友伴關係後，大多無家庭結構（單親 vs. 雙親）的差異，唯一的差異顯示單親家庭學童有積極參與團體活動或向外結交朋友的經驗，亦是家庭成員因應家庭型態而有彈性調整的證據。此外，子女的種族比例與家庭功能、家長表現與子女表現都無關聯（參見表二最右欄）。以上發現顯示，雖然本研究整合分析的文獻多在歐美社會執行，但其研究證據（包括跨國領養的亞裔子女），都彰顯即便社會氛圍對於彩虹家庭的友善程度較低，彩虹家庭具有韌性去因應可能面對的困境；而就算不同種族者可能具有不同的性格特性，家長的性傾向認同與家庭功能、子女表現多無關聯。

當然，彩虹家庭家長也有一些相較於預設型態家庭家長的劣勢。除了上述提及在對於同性戀較不友善的社會，彩虹家庭可能較難展現其支持體系的優勢，以及彩虹家庭母親通常家戶收入較低的經濟限制。彩虹家庭子女若是經歷家長由異性關係瓦解，轉往同性關係，勢必經歷家庭的變動或瓦解；此外，彩虹家庭子女可能會面臨社會上

恐同的偏見與歧視。這類型的資料較難在與預設型態家庭的比較中看出，因為相同的題項無法在預設型態家庭測量。不過，研究的確發現遭受社會上恐同偏見與歧視的彩虹家庭子女有較高的內、外化問題（Bos, Gartrell, and van Gelderen, 2013; van Rijn-van Gelderen, Bos, and Gartrell, 2015）。對比預設型態家庭子女會遭受的偏見或歧視（如單親家庭子女），彩虹家庭子女經歷偏見或歧視對待的程度並未比較高（見表二）（Tasker and Golombok, 1995），這也顯示遭受偏見或歧視對待並非僅限於彩虹家庭，不屬於傳統異性婚配的另類家庭子女，都有可能受到偏見或歧視對待。進一步而言，促進社會氛圍的改變，提升對於不同類型家庭的尊重，對於不同家庭類型的子女獲得平權的對待，是很重要的。

本研究同時回應了少數批評者對於彩虹家庭研究的質疑。其中，批評者認為彩虹家庭研究多限於較年輕的族群。然而，根據本研究的發現，子女的年紀增長後，反而凸顯彩虹家庭子女的優勢（如認知表現、自我評估），這可能是因為年紀越長，理解與因應自己的家庭型態與其他家庭不同的能力增加。再者，批評者認為彩虹家庭研究多未納入隨機抽樣或代表性樣本，但本研究中隨機抽樣與否或代表性樣本通常使兩類家庭差異更小（內化問題、外化問題），僅在一個指標上（家長的性別刻板印象）兩類家庭差異比較大，而且是彩虹家庭表現較好，其他六個指標的家庭比較結果則與隨機抽樣或代表性樣本無關，顯示研究是否選用全國性或地區性代表性樣本，是否使用隨機抽樣，並沒有根本性地改變研究發現。最後，批評者認為目前學界沒有共識，研究者提供矛盾的研究證據，也不符合本研究發現。本研究在十二個指標中，只有兩個指標的變異情況較高，不過一旦控制研究與樣本特性後（家庭支持體系：執行的地區與比較對象為單親家庭與

否；內化問題：外化問題效果量、家長是否為父親），則兩指標就沒有明顯的變異情況了，顯示即使在兩個變異程度較高的指標上，亦無矛盾的證據。

事實上，若說彩虹家庭研究沒有學界共識或研究者提供矛盾的證據，是少數研究者過度強化了極少數發現彩虹家庭子女表現很差的文獻。Mark Regnerus（2012）即是一個典型的例子。Regnerus 以蒐集到的新家庭結構研究（New Family Structures Study, NFSS），宣稱有代表性樣本與大量的彩虹家庭資料，其中比較 919 位雙親家庭子女、163 位同性戀母親子女、73 位同性戀父親子女，結果發現雙親家庭子女表現最佳。不過，Regnerus 以子女認為家長是否有過同性戀情關係來定義彩虹家庭，而且這個題目只問未與父母同住到成年的受訪者，沒有問與父母同住到成年的受訪者。亦即 Regnerus 假定與受訪者同住到成年的父母不會出軌，也不會是同性戀，恆常維持預設型態家庭，因此在區分彩虹家庭與預設型態家庭上有研究者的偏差。此外，同一筆資料在另一組研究者的分析下，亦顯示非常不同的結果。Simon Cheng 與 Brian Powell（2015）發現 NFSS 的問題數據，如資料值不符合邏輯（如受訪者自陳於未成年時參與總統投票、自述身高為八呎）；同時亦指出 Regnerus 區分彩虹家庭子女的問題，許多被列為彩虹家庭的子女者未與（同性戀）家長同住一段時間以上（如四年），要以這些子女的表現評估同性伴侶家庭功能，並不妥適。Cheng 與 Powell 經過整理重新分析，認定 51 位參與者是在彩虹家庭長大的子女，而近四成 Regnerus 定義的彩虹家庭子女無法反映彩虹家庭對子女的影響，並且在最後認定的彩虹家庭樣本數與晚近彩虹家庭研究的樣本數並無明顯優勢。此外，Regnerus、Cheng 與 Powell 都發現，在全部四十個指標中，統計穩定差異的只有四個：彩虹家庭接

受福利救助的比例高於預設型態家庭，預設型態家庭提供的安全感大於彩虹家庭，彩虹家庭子女自認為是完全異性戀的認同比例較低，彩虹家庭子女曾有同性關係的比例較高。然而，這些結果反映的是當家庭經濟狀況較差（如需要接受福利救助），提供的安全感就較低。認定自己的性傾向認同或是透過性經驗去探索自己的性傾向認同，是個人的選擇，實無優劣之別。

最後，在回顧這些彩虹家庭的研究時，筆者發現了三個值得注意的研究限制。首先，早期研究在比較兩類家庭時經常使用 t 檢定或 F 檢定去比較家庭類型的差異，問題是同一個家庭中可能有一名以上的子女，使得資料違反獨立性假定。晚期的研究則多採用多階層模式（MLM）的分析方式去比較高階層（家庭類型）對個人資料的影響（如前述貫時性研究介紹中的 Farr, 2017; Farr et al., 2010; Farr and Patterson, 2013; Goldberg and Garcia, 2016; Lavner et al., 2012），是較合適的作法。此外，擇定一個家庭一個子女的方式去評估不同家庭類型對於子女的影響，亦是避免資料違反獨立性的合宜處理。另一個此類研究可能有的問題是，有些研究者未直接詢問家長的性傾向認同（如 Fedewa and Clark, 2009; Potter, 2012; Potter and Potter, 2017; Rivers, Poteat, and Noret, 2008; Regnerus, 2012; Sullins, 2015 等）。過往未直接詢問家長性傾向認同的研究，多是透過比對家庭中是否有第二家長，或與家長的關係是否為伴侶，再比對兩者的性別，兩者皆為同性者則歸為彩虹家庭。不過，由於性別資料可能被誤植，這樣的比對錯誤可能性很高。例如 Cheng 與 Powell（2015）以美國人口普查局的例子指出，錯誤率竟可達 62%。此外，Jerel P. Calzo 等（2017）在研究中區分異性戀家長、同性戀家長與雙性戀家長，結果發現雙性戀家長自陳的家長壓力較大，子女的內外化問題也較高，然而一旦控制家長自

陳的壓力後，子女的內外化問題都和異性戀家庭子女無明顯差異。或許這是因為社會中單一性傾向的預設（同性戀 vs. 異性戀），使得雙性戀家長有較高的心理壓力，後續研究者宜清楚釐清家長的性傾向認同，以利後續家庭類型的比較能偵測不同類型家庭的促進與危險因子。

社會上的改變，往往會挑戰人們習慣的舒適圈並引發抗拒。不過，如果社會改變能夠讓不同樣貌的家庭有生存的空間，讓這些家庭成員都能有尊嚴、自在地生活，那麼這樣的改變是非常需要的。婚姻平權在台灣引發正反兩方激烈的辯論與抗爭，只是許多爭辯的內容是各自想像中家庭的樣態。研究證據能夠檢視這些想像家庭樣態的真實性，本研究透過整合分析讓彩虹家庭現身，提供辯論與抗爭判準的檢視依據，鼓勵讀者做出自己的判斷。

參考文獻

* 表示納入整合分析的文章

- 行政院主計處 (2006 年 6 月 27 日)〈家庭組成型態變遷〉。取自 <https://www.stat.gov.tw/public/Data/662814133871.pdf>
- 行政院性別平等會 (2018)〈家庭組織型態〉。取自 https://www.gender ey.gov.tw/gecdb/Stat_Statistics_DetailData.aspx?sn=iGJRpsNX45yniGDj%2Bw1ueQ%3D%3D
- 李怡青 (出版中)〈性別平權與婚姻平權：從研究結果反思社會正義〉，《應用心理研究》。
- 備課漢 (2016 年 11 月 27 日)〈我反對廢除一夫一妻婚姻制度！政治學博士警告：一旦破壞制度 各種亂象將易放難收〉。取自 <https://taiwanfamily.com/100290>
- 鄭麗珍 (2001)。〈家庭結構與青少年的生活適應之研究——以台北市為例〉，《台大社會工作學刊》，5: 197-270。
- Adams, Jimi and Ryan Light (2015) Scientific consensus, the law, and same sex parenting outcomes.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53: 300-310. doi: 10.1016/j.ssresearch.2015.06.008
- Allen, Mike and Nancy Burrell (2002) Sexual orientation of the parent: The impact on the child. In Mike Allen, Raymond W. Preiss, Barbara Mae Gayle, and Nancy Burrell (Eds.), *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 research: Advances through meta-analysis* (pp. 125-143). Mahwah, NJ: USum Associates Publishers.
- *Baiocco, Roberto, Federica Santamaria, Salvatore Ioverno, Lilybeth Fontanesi, Emma Baumgartner, Fiorenzo Laghi, and Vittorio Lingiardi (2015) Lesbian

mother families and gay father families in Italy: Family functioning, dyadic satisfaction, and child well-being. *Sexuality Research and Social Policy*, 12: 202-212. doi: 10.1007/s13178-015-0185-x [ID1; S1/2]

*Bigner, Jerry and R. Brooke Jacobsen (1989a) The value of children to gay and heterosexual fathers. *Journal of Homosexuality*, 18(1-2): 163-172. doi: 10.1300/J082v18n01_08 [ID2, S3]

*Bigner, Jerry and R. Brooke Jacobsen (1989b) Parenting behaviors of homosexual and heterosexual fathers. *Journal of Homosexuality*, 18: 173-186. doi: 10.1300/J082v18n01_09 [ID2, S3]

*Bos, Henny, Nanette Gartrell, and Loes van Gelderen (2013) Adolescents in lesbian families: DSM-oriented scale scores and stigmatization. *Journal of Gay and Lesbian Social Services*, 25(2): 121-140. doi: 10.1080/10538720.2013.782456 [ID3, S4/5]

*Bos, Henny, Justin Knox, Loes van Rijn-van Gelderen, and Nanette Gartrell (2016) Same-sex and different-sex parent households and child health outcomes: Findings from the National Survey of Children's Health. *Journal of Developmental and Behavioral Pediatrics*, 37(3): 179-187. doi: 10.1097/DBP.0000000000000288 [ID4, S6/7]

*Bos, Henny, Lisette Kuyper, and Nanette Gartrell (2018) A population-based comparison of female and male same-sex parent and different-sex parent households. *Family Process*, 57(1): 148-164. doi: 10.1111/famp.12278 [ID5, S8/9]

*Bos, Henny and Theo G. M. Sandfort (2010) Children's gender identity in lesbian and heterosexual two-parent families. *Sex Roles*, 62(1-2): 114-126. doi: 10.1007/s11199-009-9704-7 [ID6, S10/11]

- *Bos, Henny, Frank van Balen, and Dymphna van den Boom (2003) Planned lesbian families: Their desire and motivation to have children. *Human Reproduction*, 18(10): 2216-2224. doi: 10.1093/humrep/deg427 [ID7, S12]
- *Bos, Henny, Frank van Balen, and Dymphna van den Boom (2004) Experience of parenthood, couple relationship, social support, and child-rearing goals in planned lesbian mother families. *Journal of Child Psychology and Psychiatry and Allied Disciplines*, 45(4): 755-764. doi: 10.1111/j.1469-7610.2004.00269.x [ID7, S12]
- *Bos, Henny, Loes van Gelderen, and Nanette Gartrell (2015) Lesbian and heterosexual two-parent families: Adolescent-parent relationship quality and adolescent well-being. *Journal of Child and Family Studies*, 24(4): 1031-1046. doi: 10.1007/s10826-014-9913-8 [ID6, S10/11]
- *Brewaeys, Anne, Ingrid Ponjaert, Eylard van Hall, and Susan Golombok (1997) Donor insemination: Child development and family functioning in lesbian mother families. *Human Reproduction*, 12(6): 1349-1359. doi: 10.1093/humrep/12.6.1349 [ID8, S13/14]
- *Calzo, Jerel P., Vickie M. Mays, Charlotte Björkenstam, Emma Björkenstam, Kyriaki Kosidou, and Susan D. Cochran (2017) Parental sexual orientation and children's psychological well-being: 2013-2015 National Health Interview Survey. *Child Development*, 90(4): 1097-1108. doi: 10.1111/cdev.12989 [ID9, S15]
- *Chan, Raymond, Risa Brooks, Barbara Raboy, and Charlotte J. Patterson (1998) Division of labor among lesbian and heterosexual parents: Associations with children's adjustment. *Journal of Family Psychology*, 12(3): 402-419. doi: 10.1037/0893-3200.12.3.402 [ID10, S16]

- *Chan, Raymond, Barbara Raboy, and Charlotte J. Patterson (1998) Psychosocial adjustment among children conceived via donor insemination by lesbian and heterosexual mothers. *Child Development*, 69(2): 443-457. doi: 10.2307/1132177 [ID10, S16]
- Cheng, Simon and Brian Powell (2015) Measurement, methods, and divergent patterns: Reassessing the effects of same-sex parents.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52: 615-626. doi: 10.1016/j.ssresearch.2015.04.005
- *Ciano-Boyce, Claudia and Lynn Shelley-Sireci (2003) Who is mommy tonight? Lesbian parenting issues. *Journal of Homosexuality*, 43(2): 1-13. doi: 10.1300/J082v43n02_01 [ID11, S17/18]
- Conger, Rand D., Xiaojia Ge, Glen H. Elder Jr., Frederick O. Lorenz, and Ronald L. Simons (1994) Economic stress, coercive family process, and developmental problems of adolescents. *Child Development*, 65(2): 541-561. doi: 10.1111/j.1467-8624.1994.tb00768.x
- Crowl, Alicia, Soyeon Ahn, and Jean Baker (2008) A meta-analysis of developmental outcomes for children of same-sex and heterosexual parents. *Journal of GLBT Family Studies*, 4(3): 385-407. doi: 10.1080/15504280802177615
- de Leeuw, Edith D., Joop J. Hox, and Don A. Dillman (2008) The cornerstones of survey research. In Edith D. de Leeuw, Joop J. Hox and Don A. Dillman (Eds.), *International handbook of survey methodology* (pp. 1-17). New York/London: Erlbaum/Taylor & Francis.
- Ellis, Sonja J. (2004) Rights-based reasoning in discussions about lesbian and gay issues: Implications for moral educators. *Journal of Moral Education*, 33(1): 71-86. doi: 10.1080/0305724042000200001

- Ellis, Sonja J. and Celia Kitzinger (2002) Denying equality: An analysis of arguments against lowering the age of consent for sex between men. *Journal of Community & Applied Social Psychology*, 12(3): 167-180. doi: 10.1002/casp.670
- *Erich, Stephen, Heather Kanenberg, Kim Case, Theresa Allen, and Takis Bogdanos (2009) An empirical analysis of factors affecting adolescent attachment in adoptive families with homosexual and straight parents. *Children and Youth Services Review*, 31(3): 398-404. doi: 10.1016/j.childyouth.2008.09.004 [ID12, S19]
- *Erich, Stephen, Patrick Leung, and Peter Kindle (2005)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adoptive family functioning with gay, lesbian, and heterosexual parents and their children. *Journal of GLBT Family Studies*, 1(4): 43-60. doi: 10.1300/J461v01n04_03 [ID13, S20]
- *Farr, Rachel H. (2017) Does parental sexual orientation matter? A longitudinal follow-up of adoptive families with school-age children.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53(2): 252-264. doi: 10.1037/dev0000228 [ID14, S21/22]
- *Farr, Rachel H. and Charlotte J. Patterson (2013) Coparenting among lesbian, gay, and heterosexual couples: Associations with adopted children's outcomes. *Child Development*, 84(4): 1226-1240. doi: 10.1111/cdev.12046 [ID14, S21/22]
- *Farr, Rachel H., Stephen L. Forssell, and Charlotte J. Patterson (2010) Parenting and child development in adoptive families: Does parental sexual orientation matter? *Applied Developmental Science*, 14(3): 164-178. doi: 10.1080/10888691.2010.500958 [ID14, S21/22]
- *Fedewa, Alicia L. and Teresa P. Clark (2009) Parent practices and home-

- school partnerships: A differential effect for children with same-sex coupled parents? *Journal of GLBT Family Studies*, 5(4): 312-339. doi: 10.1080/15504280903263736 [ID15, 23]
- *Flaks, David K., Ilda Ficher, Frank Masterpasqua, and Gregory Joseph (1995) Lesbians choosing motherhood: A comparative study of lesbian and heterosexual parents and their children.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31(1): 105-114. doi: 10.1037/0012-1649.31.1.105 [ID17, S24/25]
- *Fulcher, Megan, Raymond W. Chan, Barbara Raboy, and Charlotte J. Patterson (2002) Contact with grandparents among children conceived via donor insemination by lesbian and heterosexual mothers. *Parenting: Science and Practice*, 2(1): 61-76. doi: 10.1207/S15327922PAR0201_4 [ID17, S26/27]
- *Fulcher, Megan, Erin L. Sutfin, and Charlotte J. Patterson (2008) Individual differences in gender development: Associations with parental sexual orientation, attitudes, and division of labor. *Sex Roles*, 58(5-6): 330-341. doi: 10.1007/s11199-007-9348-4 [ID17, S26/27]
- *Gartrell, Nanette K., Henny Bos, and Naomi G. Goldberg (2011) Adolescents of the U.S. National Longitudinal Lesbian Family Study: Sexual orientation, sexual behavior, and sexual risk exposure. *Archives of Sexual Behavior*, 40(6): 1199-1209. doi: 10.1007/s10508-010-9692-2 [ID3, S4/5]
- Gartrell, Nanette, Henny Bos, and Audrey Koh (2018) National Longitudinal Lesbian Family Study - Mental health of adult offspring. *The 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 379(3): 297-299. doi: 10.1056/NEJMc1804810
- *Goldberg, Abbie E. and Randi L. Garcia (2016) Gender-typed behavior over time in children with lesbian, gay, and heterosexual parents. *Journal of Family Psychology*, 30(7): 854-865. doi: 10.1037/fam0000226 [ID18, S28~31]

- Goldberg, Abbie E. and Julianna Z. Smith (2009) Perceived parenting skill across transition to adoptive parenthood among lesbian, gay, and heterosexual couples. *Journal of Family Psychology*, 23(6): 861-870. doi: 10.1037/a0017009
- *Goldberg, Abbie E. and Julianna Z. Smith (2013) Predictors of psychological adjustment in early placed adopted children with lesbian, gay, and heterosexual parents. *Journal of Family Psychology*, 27(3): 431-442. doi: 10.1037/a0032911 [ID18, S28~31]
- *Goldberg, Abbie E. and Julianna Z. Smith (2014) Predictors of school engagement among same-sex and heterosexual adoptive parents of kindergarteners. *Journal of School Psychology*, 52(5): 463-478. doi: 10.1016/j.jsp.2014.08.001 [ID19, S32/33]
- *Goldberg, Abbie E., Deborah A. Kashy, and Julianna Z. Smith (2012) Gender-typed play behavior in early childhood: Adopted children with lesbian, gay, and heterosexual parents. *Sex Roles*, 67(9-10): 503-515. doi: 10.1007/s11199-012-0198-3 [ID20, S34~37]
- *Goldberg, Naomi G., Henny M. Bos, and Nanette K. Gartrell (2011) Substance use by adolescents of the USA National Longitudinal Lesbian Family Study. *Journal of Health Psychology*, 16(8): 1231-1240. doi: 10.1177/1359105311403522 [ID3, S4/5]
- Golombok, Susan and John Rust (1993) The pre-school activities inventory: A standardized assessment of gender role in children. *Psychological Assessment*, 5(2): 131-136.
- *Golombok, Susan and Fiona Tasker (1996) Do parents influence the sexual orientation of their children? Findings from a longitudinal study of lesbian

- families.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32(1): 3-11. doi: 10.1037/0012-1649.32.1.3 [ID21, S38]
- *Golombok, Susan, Beth Perry, Amanda Burston, Clare Murray, Julie Mooney-Somers, Madeleine Stevens, and Jean Golding (2003) Children with lesbian parents: A community study.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39(1): 20-33. doi: 10.1037/0012-1649.39.1.20 [ID22, S39/40]
- *Golombok, Susan, Ann Spencer, and Michael Rutter (1983) Children in lesbian and single-parent households: Psychosexual and psychiatric appraisal. *Journal of Child Psychology and Psychiatry*, 24(4): 551-572. doi: 10.1111/j.1469-7610.1983.tb00132.x [ID23, S41]
- *Golombok, Susan, Fiona Tasker, and Clare Murray (1997) Children raised in fatherless families from infancy: Family relationships and the socioemotional development of children of lesbian and single heterosexual mothers. *Journal of Child Psychology and Psychiatry*, 38(7): 783-791. doi: 10.1111/j.1469-7610.1997.tb01596.x [ID23, S41]
- *Green, Richard, Jane Barclay Mandel, Mary E. Hotvedt, James Gray, and Laurel Smith (1986) Lesbian mothers and their children: A comparison with solo parent heterosexual mothers and their children. *Archives of Sexual Behavior*, 15(2): 167-184. doi: 10.1007/BF01542224 [ID24, S42/43]
- Gupta, Taveeshi, Niobe Way, Rebecca K. McGill, Diane Hughes, Carlos Santos, Yueming Jia, Hirokazu Yoshikawa, Xinyin Chen, and Huihua Deng (2013) Gender-typed behaviors in friendships and well-being: A cross-cultural study of Chinese and American boys. *Journal of Research on Adolescence*, 23(1): 57-68. doi: 10.1111/j.1532-7795.2012.00824.x
- *Harris, Mary B. and Pauline H. Turner (1986) Gay and lesbian parents. *Journal*

of Homosexuality, 12(2): 101-113. doi: 10.1300/J082v12n02_07 [ID25, S44/45]

*Hoefffer, Beverly (1981) Children's acquisition of sex-role behavior in lesbian-mother families. *American Journal of Orthopsychiatry*, 51(3): 536-544. doi: 10.1111/j.1939-0025.1981.tb01402.x [ID26, S46/47]

*Huggins, Sharon L. (1989) A comparative study of self-esteem of adolescent children of divorced lesbian mothers and divorced heterosexual mothers. *Journal of Homosexuality*, 18(1-2): 123-135. doi: 10.1300/J082v18n01_06 [ID27, S48/49]

Johnson, Blair T. and Alice H. Eagly (2014) Meta-analysis of social-personality psychological research. In Harry T. Reis and Charles M. Judd (Eds.), *Handbook of research methods in social and personality psychology* (2nd Ed., pp. 675-707). 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Jowett, Adam (2014) 'But if you legalise same-sex marriage...': Arguments against marriage equality in the British press. *Feminism and Psychology*, 24(1): 37-55. doi: 10.1177/0959353513510655

*Kirkpatrick, Martha, Catherine Smith, and Ron Roy (1981) Lesbian mothers and their children: A comparative survey. *American Journal of Orthopsychiatry*, 51(3): 545-551. doi: 10.1111/j.1939-0025.1981.tb01403.x [ID28, S50/51]

*Kweskin, Sally L. and Alicia S. Cook (1982) Heterosexual and homosexual mothers' self-described sex-role behavior and ideal sex-role behavior in children. *Sex Roles*, 8(9): 967-975. doi: 10.1007/BF00290021 [ID29, S52]

*Lavner, Justin A., Jill Waterman, and Letitia Anne Peplau (2012) Can gay and lesbian parents promote healthy development in high-risk children adopted from foster care? *American Journal of Orthopsychiatry*, 82(4): 465-472.

doi: 10.1111/j.1939-0025.2012.01176.x [ID30, S53]

Lee, I-Ching, and Wei-Fang Lin (in submission) Us versus them: The debates on the legislation of same-sex marriage in Taiwan.

Lipsey, Mark W. and David B. Wilson (2001) *Practical meta-analysis*. Thousand Oaks, CA: Sage.

Lofquist, Daphne (2010) *Same-sex couple households: American Community Survey Briefs*. U.S. Department of Commerce: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Administration, U.S. Census Bureau.

Marks, Loren (2012) Same-sex parenting and children's outcomes: A closer examination of the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s brief on lesbian and gay parenting.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41(4): 735-751. doi: 10.1016/j.ssresearch.2012.03.006

Phelan, James E., Neil Whitehead, and Philip M. Sutton (2009) What research shows: NARTH's response to the APA claims on homosexuality. *Journal of Human Sexuality*, 1: 5-121.

Potter, Daniel (2012) Same-sex parent families and children's academic achievement.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Family*, 74(3): 556-571. doi: 10.1111/j.1741-3737.2012.00966.x

Potter, Daniel and Emma C. Potter (2017) Psychosocial well-being in children of same-sex parents: A longitudinal analysis of familial transitions. *Journal of Family Issues*, 38(16): 2303-2328. doi: 10.1177/0192513X16646338

*Prickett, Kate C., Alexa Martin-Storey, and Robert Crosnoe (2015) A research note on time with children in different- and same-sex two-parent families. *Demography*, 52(3): 905-918. doi: 10.1007/s13524-015-0385-2 [ID31, S54/55]

- Regnerus, Mark (2012) How different are the adult children of parents who have same-sex relationships? Findings from the New Family Structures Study.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41(4): 752-770. doi: 10.1016/j.ssresearch.2012.03.009
- *Rivers, Ian, V. Paul Poteat, and Nathalie Noret (2008) Victimization, social support, and psychosocial functioning among children of same-sex and opposite-sex couples in the United Kingdom.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44(1): 127-134. doi: 10.1037/0012-1649.44.1.127 [ID32, S56]
- *Sarantakos, Sotirios (1996) Children in three contexts: Family, education and social development. *Children Australia*, 21(3): 23-31. doi: 10.1017/S1035077200007173 [ID33, S57]
- *Shechner, Tomer, Michelle Slone, Thalma E. Lobel, and Ravid Shechter (2013) Children's adjustment in non-traditional families in Israel: The effect of parental sexual orientation and the number of parents on children's development. *Child: Care, Health and Development*, 39(2): 178-184. doi: 10.1111/j.1365-2214.2011.01337.x [ID34, S58/59]
- *Sullins, Donald Paul (2015) Emotional problems among children with same-sex parents: Difference by definition. *British Journal of Education, Society and Behavioural Science*, 7(2): 99-120. doi: 10.2139/ssrn.2500537 [ID9, S15]
- *Sullins, Donald Paul (2016) Invisible victims: Delayed onset depression among adults with same-sex parents. *Depression Research and Treatment*, 2016(3): 1-8. doi: 10.1155/2016/2410392 [ID 38, S65/66]
- *Sutfin, Erin L., Megan Fulcher, Ryan P. Bowles, and Charlotte J. Patterson (2008) How lesbian and heterosexual parents convey attitudes about gender to their children: The role of gendered environments. *Sex Roles*, 58(7-8): 501-513. doi: 10.1007/s11199-007-9368-0 [ID35, S60/61]

- *Tasker, Fiona and Susan Golombok (1995) Adults raised as children in lesbian families. *American Journal of Orthopsychiatry*, 65(2): 203-215. doi: 10.1037/h0079615 [ID21, S38]
- *van Gelderen, Loes, Henny Bos, Nanette K. Gartrell, Jo Hermanns, and Ellen C. Perrin (2012) Quality of life of adolescents raised from birth by lesbian mothers: The US National Longitudinal Family Study. *Journal of Developmental and Behavioral Pediatrics*, 33: 17-23. doi: 10.1097/DBP.0b013e31823b62af [ID3, S4/5]
- *van Rijn-van Gelderen, Loes, Henny Bos, and Nanette K. Gartrell (2015) Dutch adolescents from lesbian-parent families: How do they compare to peers with heterosexual parents and what is the impact of homophobic stigmatization? *Journal of Adolescence*, 40: 65-73. doi: 10.1016/j.adolescence.2015.01.005 [ID36, S62]
- *Vanfraussen, Katrien, Ingrid Ponjaert-Kristoffersen, and Anne Brewaeys (2002) What does it mean for youngsters to grow up in a lesbian family created by means of donor insemination? *Journal of Reproductive and Infant Psychology*, 20(4): 237-252. doi: 10.1080/0264683021000033165 [ID37, S63/64]
- *Vanfraussen, Katrien, Ingrid Ponjaert-Kristoffersen, and Anne Brewaeys (2003) Family functioning in lesbian families created by donor insemination. *American Journal of Orthopsychiatry*, 73(1): 78-90. doi: 10.1037/0002-9432.73.1.78 [ID37, S63/64]
- *Wainright, Jennifer L. and Charlotte J. Patterson (2006) Delinquency, victimization, and substance use among adolescents with female same-sex parents. *Journal of Family Psychology*, 20(3): 526-530. doi: 10.1037/0893-

3200.20.3.526 [ID38, S65/66]

*Wainright, Jennifer L. and Charlotte J. Patterson (2008) Peer relations among adolescents with female same-sex parents.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44(1): 117-126. doi: 10.1037/0012-1649.44.1.117 [ID38, S65/66]

*Wainright, Jennifer L., Stephen T. Russell, and Charlotte J. Patterson (2004) Psychosocial adjustment, school outcomes, and romantic relationships of adolescents with same-sex parents. *Child Development*, 75(6): 1886-1898. doi: 10.1111/j.1467-8624.2004.00823.x [ID38, S65/66]

◎作者簡介

李怡青，台灣大學心理學系教授，研究興趣在於探討文化、群際關係結構、偏見與歧視，以及社會改變之間的關聯。研究的特點在於使用不同類型的研究方法（整合分析、實驗法、調查研究法、內容分析法等），相信每個研究方法各有擅長回答的問題，兼用不同的研究方法對關心主題有不同的視角。研究主題包括：(1) 性別議題；(2) 權力與需求；(3) 文化、群際關係與偏見；(4) 政治心理學。

〈聯絡方式〉

Email: icl2018@ntu.edu.tw

The Coming-Out of Rainbow Families: A Meta-Analysis of Outcomes for Parents and Offspring

I-Ching Lee Department of Psychology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Same-sex families were once considered an anomaly, but they have now become a force which challenges norms and demands legal protections for alternative families. After the passage of marriage equality legalization in various countries, same-sex couples have gained the rights to artificial impregnation and adoption, thus diversifying same-sex families. According to previous meta-analyses, overwhelming similarities between same-sex and different-sex families were observed; however, the lack of evaluation of the variation in the effect sizes has limited the contributions of these studies. In addition, even though legal protections for same-sex families have been offered in various societies, stereotypes (e.g., could men be good caretakers?) and concerns (e.g., perhaps the advantages of different-sex families would be apparent when toddlers grow up) still exist. This article utilizes a quantitative meta-analysis to compare same-sex and different-sex families in terms of family functions, and outcomes for parents and offspring. This research replicates the findings in previous meta-analyses. There is virtually no difference between these two types of families. Extending previous findings, same-sex fathers are as good as same-sex mothers and different-sex parents. Examining children born via insemination or adoption also demonstrates similarities in same-

sex and different-sex families. Children's racial composition does not moderate family functions or outcomes for the parents and their offspring in the two types of families. The age of the offspring matters only in the case of a couple of indicators. When the children grow older, children in same-sex families perform better in cognitive evaluations and self-evaluations than children in different-sex families. The above findings are consistent with the previous research consensus that parental sexual identity has little effect on family functions, or on outcomes for parents and children. I will further discuss potential facilitating and risk factors for family functions and outcomes for parents and their offspring.

Keywords: same-sex fathers, same-sex mothers, artificial impregnation or insemination, adoption